

從義愛公故事看日警變成臺灣神的
虛實與意義

沈佳姍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作為日警臺灣神的義愛公，其故事傳說會因記錄者不同而有差異，其身分象徵從臺灣民間、地方行政機構、警察同僚、民俗學者、各時期不同政治與社會氛圍等角度來看，也各有不同。面對多元多貌的義愛公信仰與論述，本文從追溯日治時期的史料著手，透過對相關記錄的譯述、考證和貫時性比較，探討義愛公諸傳說故事中呈現的虛實狀況、義愛公傳說在不同時期的變形、義愛公信仰所象徵意義的轉變。本文呈現，相較於森川氏的事蹟在 1900 年代被有意無意的隱晦、1920 年代因祂被奉祀為神而出現報紙報導，到 1930 年代則是森川氏故事最被推廣周知和被多元論述的時期。此時期的多元論述，包括以森川氏之例：一、鼓勵讀者反思警民關係和「民眾警察」語彙的意涵；二、雖為異族的執政者卻熱愛臺灣居民到犧牲自己係難能可貴，但看待事物不能僅從個人或民眾的角度思考；三、可視以「部落教化神」的身分兼而推展同化政策；四、因臺灣人既有宗教習慣而成為防疫神和媒介童乩開藥方，進而成為當地居民本土化和在地化信仰的一環等等。以上呈現了「日警臺灣神」即使在同一時期內，也被賦予、承載不同背景人們的不同意念，即義愛公的身分和意義可因時空所需而有多種轉化的可能。森川氏可說是以森川氏、義愛公的身分存在，更是為了時人的實際需求而存在。

關鍵字：明治的吳鳳、日本警察、臺灣神、嘉義東石、義愛公、醫藥神、童乩

壹、前言：義愛同行——日警森川清治郎的忠義仁愛與生平

臺灣嘉義縣東石鄉副瀨村有個富安宮，全名是東石副瀨富安宮。從 2018 年的數位地圖資訊來看，富安宮離海岸不遠，且已整修成頗具規模的大宮廟（圖 1）。據《臺南州祠廟名鑑》和富安宮官方網頁記錄，富安宮興建於清光緒 5 年（1879），由黃漏、李審、林余、柯全等人募捐 2,300 元所創建。開基神尊為渡海來到副瀨村的朱府千歲（五府千歲之一員），同祀其祂千歲、觀音佛祖、天上聖母等神佛。固定祭典是每年 4 月初七的媽祖繞境，6 月初一代天巡狩入境鎮守（王爺），和 10 月下旬的燒王船。¹此外，富安宮還有個特色，就是祂是臺灣少見之供奉日本警察——義愛公森川清治郎——為神明的寺廟。因為有恭奉義愛公，2003 年 7 月，日本醫療義工團在阿里山進行義診前特地前來參拜；²2011 年 3 月，也有 20 位日本警察前往祭拜。³過去，已有不少人介紹富安宮的日本神並討論其祭拜意義，但因史料與語言的限制，使其等的研究成果仍有不少可再深入增補與延伸討論處，尤其在史料論介的層面。⁴因此，本文擬以日治時期對富安宮義愛公記錄的譯述和考證為核心，貫時且深入的探討日警義愛公如何變成臺灣神、被發揚相關典故的虛實與其時代意義。

1 副瀨富安宮，〈副瀨富安宮略史〉，副瀨富安宮網站，<http://hgj0949.myweb.hinet.net/>（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2 江俊亮，〈日本醫療團到阿里山義診為老人量血壓把脈〉，臺灣大紀元網站，2003 年 7 月 15 日，goo.gl/3QWg7F（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3 徐彩媚，〈日警祭拜警察神〉，臺灣蘋果日報網站，2011 年 3 月 11 日，goo.gl/XdMubg（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4 如戴文鋒，〈臺灣唯一的日本王爺——東石鄉副瀨村富安宮的故事〉，收入《文學講古——鄉鎮的故事》（臺北：行政院文建會，2001 年）；尾原仁美，〈臺灣民間信仰裡對日本人神明的祭祀及其意義〉（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江志宏、郭盈良，〈嘉義市小副瀨「義愛公」信仰的社會意義〉，《嘉義研究》，1 號（2010 年 3 月），頁 241-279 等等。



圖 1. 東石副瀨富安宮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Google，〈東石富安宮〉，Google 地圖網站，goo.gl/HVKb29（2018 年 4 月 29 日點閱）。

義愛公本名森川清治郎（約 1861-1902），⁵是日治臺灣初期的日本籍警察。雖然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嘉義廳報》（含各種任免辭令）等政府文書或數位資料庫中均無森川清治郎與類似名稱的記載，但森川氏似乎是真有其人。一方面，《臺灣日日新報》和《臺南新報》在 1923 年均出現了關於森川氏的報導。內容大要是說，在臺南州東石郡東石庄副瀨（今東石鄉鰲鼓村）的保正李久和黃鄙 2 人主唱下，村民決定一起製作故東石港支廳巡查森川清治郎的木像，合祀於地方的富安宮內，當作神明一樣的膜拜信仰，現（1923）正製作木神像中。這並非誑語，而會如此的原因，據說係因為森川氏在副瀨派出所任職時，很真心致力於日常的警察事物。他會親自執鋤指導農民農業，以私財購買獎

5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1，《臺灣警察時報》，206 期（1933 年 1 月），頁 130；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5，《臺灣警察時報》，210 期（1933 年 5 月），頁 99。

品鼓勵優良的臺籍學生，一一慰問病人，施惠予貧困者，如慈父般的撫慰庄民，也因此得到村民的尊敬。1902 年初，因為課徵竹筏稅會增加村民負擔，森川氏乃向當時的東石支廳長提出請願，卻被支廳長嚴厲斥責。鬱悶的森川氏因此於 4 月 7 日持槍射穿咽喉自殺，聽聞此事的村民也無不悲傷。1923 年 5 月，副瀨的臨庄發生腦脊髓膜炎，⁶副瀨的保正李久卻夢見森川巡查現身告訴要注意衛生等。伴著迷信思想，居民決議要製作森川氏的木像，合祀於地方廟宇，並計畫於 5 月 22 日舉行合祀儀式。⁷以上報導的內容看起來真實且合乎常理，只是，除了森川氏、李久、黃鄙等名諱不見於 1920 年前的前述官方文書或數位資料庫中，關於竹筏課稅事件，綜覽 1901～1902 年的《嘉義廳報》，較相關的指令也只有 1901 年 12 月 16 日嘉義廳長向各支廳發出告示第 8 號，要警察協助「依臺灣船籍規則，進行船舶體積測量的預備調查和傳達許可登錄證（鑑札）有關事項」。⁸

二方面，根據臺南佐佐木周次郎 1932 年 3、4 月在《臺灣警察時報》連載的〈被祭祀為神的警察官〉一文指出，森川氏係神奈川縣久良岐郡戶太町（今橫濱市西區）出身，1900 年 8 月被派往嘉義辨務署東石支署鰲鼓派出所（一度更名為臺南州東石郡屯子頭派出所）任職。⁹在追查森川氏的生平事蹟時，佐佐木在同派出所的「須知簿」中，見到有段這樣形容森川的話：

森川巡查資性英邁、清廉潔白、恬淡金錢、不計私慾、常持正義、勇敢果決、義俠心厚，與鄉民無上下之隔，公平無私、細心親切，

6 1918 年臺灣已引進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苗並登錄之為法定傳染病。1923 年初，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再度發生，臺南州是最主要的疫區，全年發現患者 442 人。期間，由於同年 4 月日本皇太子即將訪臺，故更加注意相關的檢疫和預防措施，包括在臺南州的嘉義增設防疫本部。沈佳姍，〈日本統治時期臺灣腦炎防疫及其病名之確立〉，《臺灣風物》，64 卷 4 期（2014 年 12 月），頁 125、131-133。

7 〈今は昔上官に曲解され憤死した故森川巡查が部落の民に慕はれて木像を作つて廟堂に合祀〉，《臺南新報》，臺南，1923 年 5 月 17 日，版 2；〈死後神と祀らるゝ森川巡查至誠の余薫〉，《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3 年 5 月 18 日，版 7。

8 嘉義廳編輯，《嘉義廳報》，第 8 號（1901 年 12 月 16 日），頁 24。

9 佐佐木周次郎，〈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 一〉，《臺灣警察時報》，196 期（1932 年 3 月），頁 79。此外，佐佐木氏於 1944 年進入臺灣總督府警察課擔任警部。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44 年），頁 241。

深受鄉民愛戴。但若有事，就嚴格處理，不以藉口推託，處理上也能得宜。即使惡漢無賴之徒，也信服於其兼具溫情與嚴格的處事之下，接受勸告，改歸正業。又他對貧民，提供患病且生活困難者藥劑和救濟；對一般鄉民，則獎勵產業發展，常在巡邏田地（田圃）時也教導耕作的方法；對在農作成績上有優良表現者，則利用保甲會議等場合予以表揚。此外，他也在書房集合有志於學的兒童，屢屢自己出測驗，並給成績優良的兒童筆紙墨等獎勵品。他在各方面都愛護著鄉民，努力感化遷善之，即使筆墨也無法盡記其功。¹⁰

從前引文，可見 1932 年佐佐木氏的記錄已較 1923 年的報紙報導提供了更多關於森川氏的具體生平和經歷事蹟，以及出現了官方文書——派出所「須知簿」的記錄。「須知簿」在臺灣約從 1922 年起出現，係警務部、郡役所、警察署、警察分署、警察官吏派出所及駐在所等警察和行政單位均需準備的簿冊，內容整合過去的多項報表，記載該轄區的地理地目與距離、戶數人口、重要物產物價、居民職業、特殊人事、特定商家、公共建築、疫情、街庄和警察官吏派出所沿革等諸多事務，且每年 6 月底和 12 月底需重新調查，更新紀錄。¹¹1920 年前幾乎不見於官方文書資料中的森川氏事蹟，有可能因為地方行政和記錄方式改制等因素，而被登載於警察文書中。

繼佐佐木氏的投稿後，1933 年臺南州警務課再詳細調查森川巡查的事蹟，並刊登連續五篇、共九項目的報導於《臺灣警察時報》，內容包括森川氏的事蹟、經歷、家人、成神經過，和生前實影（圖 2）、保正李九和廟管理者黃鄙的合影照（圖 3）等多幅照片。文中記錄；森川氏為平民出身，自幼即樸素純情，喜好詩文俳句，渡臺前係擔任橫濱監獄的看守。育有一男森川真一（約 1898-1957）。¹²1897 年 5 月 4 日，時年 36 歲的森川氏以警察

10 佐佐木周次郎，〈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二〉，《臺灣警察時報》，197 期（1932 年 4 月），頁 61。

11 臺南州，《臺南州例規下》（臺南市：臺南州，1923 年），頁 8-29。

12 日治時期的史料多記載 1902 年森川氏身亡時真一僅 4 歲，筆者由此推估真一的生年約 1898 年。但當代的二手研究，以及森川愛口述之《義愛公傳》則說森川氏 1892 年與兜木ちよ（千代）結婚，1893 年長子（獨子）森川真一出生（以森川氏身亡時，其子為 10 歲的時間作推估）。本文中真一的卒年也是出自《義愛公傳》。森川愛口述，平井新著作，王力生翻譯，《義愛公傳》（臺北縣：新莊北巡聖安宮管理委員會，1999 年），頁 2。

官的身分來臺。但他不像其他帶有日本帝國主義霸氣的青年來到殖民地一般，反而以溫和的性情處事。來臺不到一個月，6月3日他成為臺南縣巡查，1899年6月4日改命為打貓辨務署（約今民雄）勤務，12月再被改命為同辨務署大莆林支廳（今嘉義大林）勤務。當時大莆林是防患土匪的重要警戒地，警察最重要的勤務是攜帶長槍警戒和維持治安。約4個月後，森川氏被改命為新巷支廳（今新港）勤務，1900年6月20日再被改派到東石港支廳鰲鼓派出所任職。當時的臺灣因為剛改朝不久，人民不信任新政府和日本人，觀念傳統，還有各種土匪和抗日團體，因此警察要處理的業務非常多。¹³其中，祭祀森川氏為神的副瀨部落就位於海邊，居民以半農（種植花生等）半漁（竹筏漁業）為業，生產額少，很少有富裕者。而森川氏的性格，依警察死歿者名簿的記錄，為「個性豪爽篤實，體幹雄偉」。訪問1933年時正擔任新營大埔公學校長的遺子森川真一，¹⁴回憶他的父親「高約5尺1、2寸（約172公分）」。再四處訪談森川氏的為人，前東石支廳長園部龍因（1868-？）¹⁵說他「善文筆，務實正直，待民穩當，受民尊敬，稍微嗜酒」。期間，鰲鼓派出所因行政改制被廢除，合併於副瀨派出所，新的職員宿舍就位於富安宮旁。改制後，森川氏仍非常關心過去的部落居民，在學業、農耕、醫療、濟貧等方面多有協助，也認真從事家計訪查、政策說諭和治安守護等工作。¹⁶從以上臺南州警務部的調查，更細緻且具體生動地呈現出森川氏的生平和親民良善的形象。

13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1，頁130-133。

14 森川真一，1918～1920年在嘉義廳鹽水港公學校（位在今臺南鹽水）任職，1920年取得教員證書，1922～1930年先後在臺南州果毅後和小腳腿公學校（位在今新營）任訓導，1931～1934年在臺南州前大埔公學校任（位在今新營）訓導，1936～1944年先後在臺南州土城子和鐵線橋公學校（位在今安南區）任訓導。「教員免許狀授與（森川真一）」（1920年1月1日），〈大正九年十五年保存第七十四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6890012；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製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資料庫，goo.gl/q924mv（2017年10月4日點閱）。

15 園部龍因，1897年10月起在臺灣南部各地擔任警部。1902年為嘉義廳東石港支廳警部兼支廳長。1907年退休。「園部龍因ニ恩給下賜ノ件（內閣總理大臣）」（1908年11月20日），〈明治四十二年永久保存第四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456005。

16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2，《臺灣警察時報》，207期（1933年2月），頁65-67。



圖 2. 約明治 34 年 (1901) 的森川氏 (第一排最左端)。其他巡查穿皮鞋，森川氏卻穿草鞋，也被視為親民的象徵。

資料來源：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 1〉，《臺灣警察時報》，206 期 (1933 年 1 月)，頁 130。

者 唱 首 の 祀 合



鄙黃者理管廟(左)九李正保(右)

圖 3. 警務部拍攝之「倡導將森川氏合祀於廟的首唱者—(右)保正李九和(左)廟公黃鄙」。

資料來源：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 2〉，《臺灣警察時報》，207 期 (1933 年 2 月)，頁 66。

貳、1930 年代崛起的義愛公故事

相較於森川氏的事蹟在 1900 年代被有意無意的隱晦、1920 年代因祂被奉祀為神而出現幾篇報紙報導，到 1930 年代，可說是森川氏的故事如風起雲湧般出現，最被推廣周知的時期。先是 1932 年佐佐木氏發表〈被祭祀為神的警察官〉一文，¹⁷《語苑》也選出一篇〈被祭祀為神的森川巡查之實話（真實故事）〉作為臺語讀本教材，¹⁸繼而隔年臺南州警務部追加刊登對森川氏事蹟的系列記錄，¹⁹再隔年警察田中氏和鈴木清一郎發表相關記述，²⁰緊接著是臺南官方於 1936 年出版《明治的吳鳳－森川清治郎巡查》專書作為兒童的推薦讀物，²¹《臺灣日日新報》報導，²²和民俗人類學家國分直一（1908-2005，岳父野田兵三為臺南州衛生課長）繼之發表地方民祭拜森川氏的典故和特色。²³如上所列舉之義愛公的故事會在 1930 年代欣欣出現的原因，可能與 1932 年 3 月今川淵（1886-？）上任臺南州知事，巡視地方時發現森川氏的事蹟並表達重視有關。²⁴那麼，各種刊物在 1930 年代所記錄的義愛公故事為何呢？

17 佐佐木周次郎，〈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 一〉，頁 79；佐佐木周次郎，〈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 二〉，頁 61。

18 東石生，〈入賞 神に祀られし森川巡查の實話〉，《語苑》，25 卷 5 期（1932 年 5 月），頁 54-62。

19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1，頁 129-133；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2，頁 63-67；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3，《臺灣警察時報》，208 期（1933 年 3 月），頁 102-104；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4，《臺灣警察時報》，209 期（1933 年 4 月），頁 134-138；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5，頁 98-101。

20 田中きわの，〈部落教化の神さま〉，《臺灣》，39 期（1934 年 7 月），頁 38-39；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4 年），頁 373-380。此外，鈴木清一郎於 1923～1937 年間，在臺灣各地擔任警部補、警部。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製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資料庫，goo.gl/q924mv（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21 志村秋翠，〈明治の吳鳳〉（臺南市：臺南みどり社，1937 年）。

22 〈死を越ゆる愛 今は神に祭らるる 東石庄の森川巡查〉，《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 年 9 月 30 日，版 5。

23 國分直一，〈義愛公と童乩と地方民〉，《臺灣教育會雜誌》，415 期（1937 年 2 月），頁 49-55。本篇也刊於國分直一，〈義愛公と地方民〉，《南方臺灣民俗考 壺を祀る村》（東京市：三省堂，1944 年），頁 131-143。

24 新高新報社，《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頁 12；田中きわの，〈部落教化の神さま〉，頁 38。

一、1932 年佐佐木訪問李九記錄

在 1932 年佐佐木氏的著作中，同於 1923 年《臺灣日日新報》等報紙的報導，佐佐木氏在訪問保正李九時，李九也提到森川氏的務實親切、照顧鄉民、對竹筏稅的諫言、受辱舉槍自殺、1923 年發生腦脊髓膜炎疫情時託夢指導防疫而被奉為神靈供養（圖 4）。訪問與報導時間雖然相隔 10 年，但兩次的口傳內容大體上是相同的，唯相關形容與事蹟更加詳盡仔細。據佐佐木氏轉載李久的說法：

森川的長相連鬼看到都會逃跑！他的鬍子黑黑長長地、長到覆蓋住胸部；眼睛比鏡子還亮；怒吼一聲，就讓人不禁縮起身子！但是，他一次也沒見過森川生氣的樣子。他是非常親切的人。我當時擔任甲長，而他的臺語還不是很好，但他會懇切地傾聽居民的事。

一位約 5 年前（即約 1927 年）過世，名叫黃溪的男子，某次在海岸邊採牡蠣時，腳被牡蠣殼弄傷，坐在泥中哭泣求援。正在巡視的森川聽到呼叫聲，就尋聲覓人，再把黃溪背回黃家。隔天黃溪去向森川致謝，卻見到森川的腳上綁著繃帶在睡覺。原來，森川在背著黃溪回家的途中，腳也被牡蠣所傷，傷口甚至比黃溪的還深、大兩倍！之後森川有將近一週不能外出，只能躺在床上，但他仍然關心掛慮著黃溪的傷勢。此外，他也一週一次在書房出題目，對成績好的人贈送書籍或筆記本等等以資鼓勵。也教導農民調整傳統的耕作和施肥方式，以在當地多鹽分土地和季節風吹拂的環境中求生。

明治 35 年（1902），總督府開始開徵漁業稅。竹筏一艘要課稅 3、4 圓。²⁵民眾對加稅雖然沒有表達反對，但是森川覺得生活貧困

25 以當時的物價水準來說，1902 年 2 月，鹽水港廳因旱災而物價騰貴，米價尤甚於前一年度 2 倍的情形下，粟是一石（10 斗，約 70 公斤）3.2~3.8 圓。鹽是每百斤 17~22 錢。〈鹽港米價〉、〈鹽價改正〉，《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2 年 4 月 26 日，版 3。

的當地民眾不一定負擔得起，所以用將近一週的時間，一一仔細地調查居民的經濟狀況，結果發現當地住民有一半以上都屬於生活不安定的族群，能否繳出上述的稅金是有困難的。得到如此心得的森川，就在員警的定期召集日時（4月5日²⁶）向支廳長園部龍因警部提出他的感想建議。但是，支廳長卻認為森川巡查是煽動人民、主張要減輕稅金而產生這樣的陳情，就在大怒下把森川大大叱責一頓。

定期召集日後，隔天下午（另有一說是當天下午²⁷）約5點回到任職地的森川，很悲痛地對當地鄉民說：「就稅金這件事，憑我個人之力實在已經無法改變它。我不僅因此反而被支廳長訓誡，在同僚面前我也很難堪。各位也很辛苦，但因為有這兩天的事，我也由衷地懇請大家，仍必須為了國家而繳納稅金…」此際的森川在語尾處有點異狀，因為森川的眼淚快湧出來了。

鄉民們見到森川這麼悲壯的言辭和眼淚，不知為何感到一種不祥的預感。在心痛下，當夜就組織壯丁5人，在森川的宿舍外注意森川的狀況。

當晚，什麼事也沒發生。隔天，森川雖比平時稍微沉悶一點，但一樣是到事務所執行公務，大家因此放下心來。但是，就在4月7日的上午9點左右，森川在巡視港墘厝村落（今嘉義縣東石鄉龍港村港墘厝）時，卻在當地慶福宮（今嘉義縣東石鄉龍港村慶福宮）廟內東北角的杉板旁，使用事先借出來的明治十八年式村田步槍（村田銃），朝自己的咽喉處開槍；子彈貫穿頭蓋骨，立即死亡。²⁸

26 此日期出自東石生，〈入賞 神に祀られし森川巡查の實話〉，頁58。

27 東石生，〈入賞 神に祀られし森川巡查の實話〉，頁58。

28 此外，黃國哲說森川氏是以腳指扣下扳機自殺，因此義愛公乩童起乩的樣子是模仿祂當時成仁的模樣而成。黃國哲，〈日本巡查，臺灣神明——「義愛公」的田野調查〉，《民俗與文化》，4期（2007年10月），頁194。

此槍聲驚動當地，無論廟宇住持和附近住民都跑來看發生了什麼事；只見到森川呈現如神一般的親切和藹之貌，只是他沒有辦法再為大家做任何事了。

20 幾年後，約大正 12 年（1923）2 月，當地發生腦脊髓膜炎疫情，接連出現的病死者，使火葬場的熾熱火焰都沒有停止的時候。但 2 月 7 日晚上，我（指保正李九）在睡覺時看見森川穿著當時的制服制帽，手提著警察用的提燈，站在我的枕頭旁。祂以嚴肅的語氣對我說：「現在港墘厝附近的村落在流行惡疫，如果不充分注意的話會有危險。預防法是這樣這樣，治療法是這樣這樣…」森川仔細地對我說完，祂的樣子就消失了。

我大驚，把這件事告訴村民，並實施森川告訴我的預防法和治療法。結果，從副瀨部落開始，再也沒出現任何一名病死者。

向來都很景仰森川在世時溫厚仁德的村民們，現在更加對森川感到感激。在得到鄉民們的贊同後，我們就雕製森川的木神像，供奉在慶福宮中。現在，祂可以更廣泛地照顧本島臺灣人，祭拜的香火朝夕不絕（圖 4）。²⁹

29 佐佐木周次郎，〈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 一〉，頁 79；佐佐木周次郎，〈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 二〉，頁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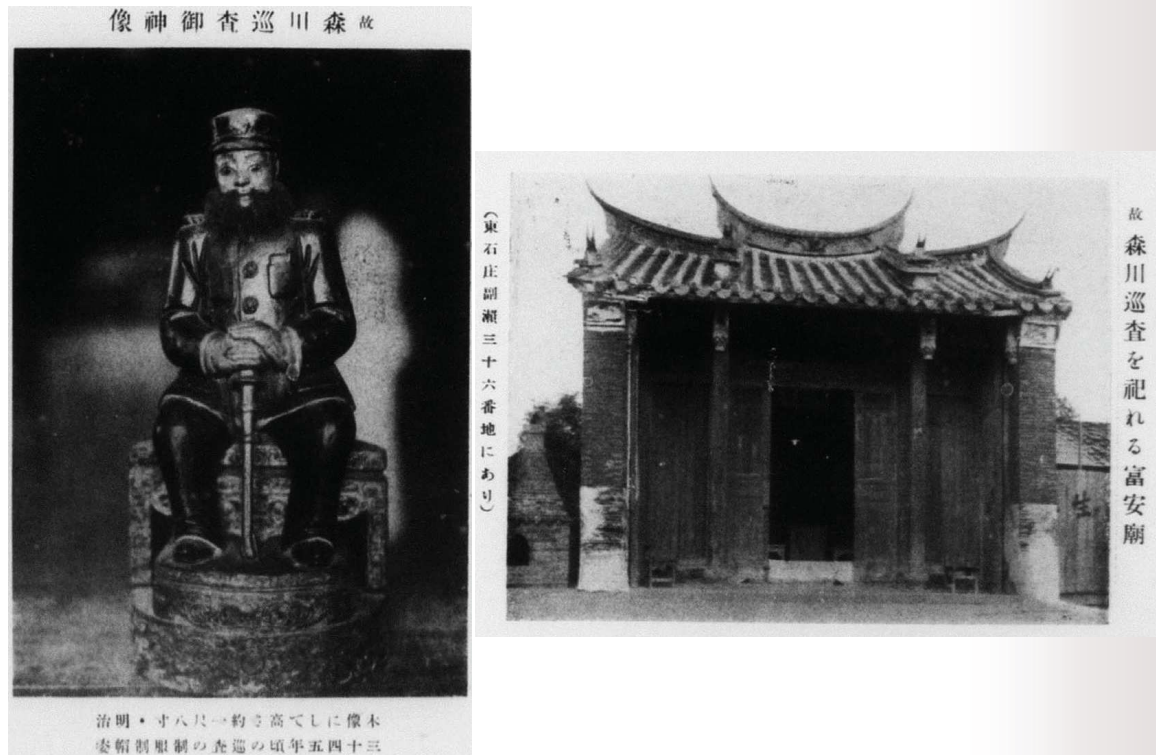


圖4 (左) 故森川巡查的神像。木像高約1尺8寸(約54.54公分)，身著明治34、35年(1901、1902)左右的巡查制服衣帽。(右) 祀奉故森川巡查的富安廟，位在東石庄副瀨36號(今東石鄉富瀨村57號)。

資料來源：志村秋翠，《明治の吳鳳》(臺南市：臺南みどり社，1937年)，照片頁。

從佐佐木氏轉載李九的敘述，在處處透露溫和相親的敘事中，呈現森川氏面惡心善、待民如子(如黃溪的故事)、鼓勵學業、指導農漁、因竹筏稅事件而自殺、森川氏託夢指導防疫法而被崇祀等重點事蹟。只是，文中所述入祀的地點是森川氏自殺所在的慶福宮——也位在東石，離富安宮不遠，但兩者是在相臨村莊的不同廟宇。然而，再從其他文獻來看，森川氏的入祀廟宇應是富安宮而非慶福宮(參後述)。時至今日，慶福宮也沒有祭祀義愛公。³⁰此外，與佐佐木氏的著作發表同年(1932)，被警務部選為臺語教材入選作品的〈被祭祀為神的森川巡查之實話〉中，森川氏被

30 筆者訪問東石慶福宮服務櫃臺，時間：2018年2月13日上午10時40分。

記述的事蹟大抵同前，但增加了幾點形容。一是森川氏處事不分貴賤，一律按規則平等公平以待，即使惡漢無賴之徒也會服從其教導，並有不少人因此改惡向善。二是提出全國有數萬名警察，但其中能像森川氏一樣受民愛戴者能有幾人？以森川氏案例，教材內文也鼓勵讀者可以反思警民關係和「民眾警察」一詞的意義。³¹

二、1933～1934 年的調查記錄與論點

延續佐佐木氏的調查，臺南州警務部也查訪了森川氏的生平與事蹟，並連載於 1933 年初的《臺灣警察時報》。內容除了如前所述的部分，臺南州警務部還訪問了森川氏的遺子森川真一等人，並提供了森川氏生前、保正李九和廟主黃鄙、廟守王棍、副瀨部落的長老們、入祀的富安宮和身亡時的慶福宮的相片，使整體森川氏的故事更生動真實。³²而臺南州警務部所記錄之森川氏在臺灣的其他事蹟，還有如森川氏巡視地方時會帶著書房教師或區役所書記張闊嘴（1933 年仍在世，為鰲鼓庄民）一起行動；訓誡怠惰嚴重的居民；自費購買獎品鼓勵農業精進者；身先士卒地持鋤修繕道路；訪查各家內情，避免讓居民做強人所難之事，所以居民中沒有一戶人家討厭森川氏。此外，1901 年朴子腳（今嘉義朴子）發生嚴重的土匪來襲事件，森川氏除緊急公告大家要注意安全，安排長子真一到鰲鼓區長蔡稠家避難，自己則坐鎮派出所內準備禦敵。幸好土匪從居民口中得知森川氏的為人，所以刻意繞過派出所，森川氏也因此毫髮無損。但土匪事件後，流言蜚語和賞罰功過接踵而來，其中蔡稠被認為擔任保甲不力和與土匪有關而被羅織入罪，是森川氏無懼於同僚反感和上司疑心，努力探查，向長官力主蔡稠的冤屈，才使蔡稠免罪。蔡稠的子孫因此非常感謝森川氏，居民也更增加對森川氏的信任。³³

31 東石生，〈入賞 神に祀られし森川巡查の實話〉，頁 58-62。

32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1，頁 130；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2，頁 64、66；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3，頁 104；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4，頁 135；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5，頁 99-100。

33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3，頁 102-104。

臺南州警務部還記錄著，當年（1902）因為天災和匪害，不論農商的生計與產業都大受打擊，日常飲食也出現困難。得知此事的森川氏，就利用年末的機會，自費購買糧食點心讓居民得以迎接新年，也讓居民深受感動。然而，東石地區遭逢凶年時，恰逢兒玉總督為了開展「臺灣十年計畫」，開始實施地方稅規則，包括年稅從 50 錢激增成為 8 圓，以及雜種稅中增加漁網稅等等。對於許多居民繳不出稅金，森川氏則於實地訪查後向長官陳情希望減稅，卻因此成為使祂自殺的導因。對此稅收致自殺事件，臺南州警務部在文章中有不少探討。包括：一、警務部查訪居民時都沒聽過年稅的問題，居民間口傳的爭議點是竹筏一艘 3、4 圓。但警務部再參考 1902 年的地方稅制，實是一艘船筏 50 錢，魚網一個年稅 30 錢，所以警務部不知道究竟如何出現竹筏一艘 3、4 圓的說法。此外，森川氏陳情後，賦稅課也透過區長役場注意到部落的實況，而從隔年起減少 50 錢的年稅。³⁴第二，臺南州警務部認為稅務是全臺一體的統一措施，森川氏超越其職責範圍，額外調查居民的生計與民情後向上級報告陳情，但忽略了對臺灣民族稅制的充分認識和當時租稅政策的大局，思考的立場與上級不同，也容易曲解上司的態度和責備內容。³⁵第三，森川氏陳情未果，再加上年逢大旱民生痛苦，森川氏對此不忍而已興起厭世之念；不久又發生部落的水牛被竊，森川氏追賊失敗，向東石港支廳長報告時還被揶揄說你有沒有喝醉，讓森川氏對長官不信任他的態度感到憤慨不已。最後，雖然森川氏的妻子和同僚於此後有特別關注森川氏的行為，但無法排除森川氏內心中認為自己無法為居民爭取福祉等等鬱悶，森川氏選擇留下遺書「被懷疑了已無法辯解，所以有所覺悟」，在副瀨派出所轄內港墘庄西南的慶福宮舉槍自盡。當時的廟守王棍（1933 年仍在世）聽到聲響趕過去時，只見到身著制服制

34 王振榮對此有不同說法。依王振榮約 1973 年訪問森川獨子真一之妻「愛」和參照村中流傳說法，認為此係因為森川自殺後，上級為了消散此事，慌張地趕快取消對森川的戒告處分，賦稅課也重新調查稅金並發現其中謬誤，故隔年減少年稅 50 錢。王振榮，《義愛公傳——超越時空生息的森川清治郎》（臺北：三友圖書，2002 年），頁 4。

35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4，頁 134-138。

帽的森川氏屍體。事後，除了居民悲傷悼念、園部龍因警部兼支廳長等人前來視察，森川氏屍體也馬上在現場附近火葬，在慶福宮西北一帶的廣場舉行告別式。森川氏的遺孀和遺子則於收拾家當後搬遷到東石港的熟人家，而感念森川氏的居民們則以新鮮的漁獵農物送別之。再之後，森川氏遺孀兜木ちよ（千代）因園部警部的媒介，1904 年與鹽水港廳巡查廣瀨秀臣（1868-？³⁶）再婚，但 3 年後死亡。森川氏遺子森川真一由廣瀨氏撫養長大，現（1933）擔任前大埔公學校長。真一的性情和其父一樣，溫厚篤實，以好校長著稱。³⁷

臺南州警務部也詳記森川氏成神的經過和各種靈異。即 1923 年，副瀨部落旁的港墘庄部落出現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患者，副瀨部落也隨之出現患者。就在此際，保正李九突然夢見森川氏身穿警察服制前來指導防疫法，被視為顯靈，因此居民們決定供奉森川氏的塑像於富安宮中。木像請朴子街的朴子人雕刻師周啟元製作，高 1 尺 8 寸。據說，周氏一開始只設定森川氏身著當年的警察服制，但其他形貌該如何處理卻毫無想法。某夜，周氏忽然夢見森川氏，因此以森川氏出現在夢中的姿態，雕刻出端坐在椅子上的森川神像，也因此雕刻得如同真人一般。³⁸透過上述，可見相對於過去較簡短的報導，1933 年時的臺南州警務部可說是將森川氏的真實與口傳故事調查的透徹詳盡。尤其對引發森川氏自盡的漁業稅，也有追查 1902 年政策，發現民間口傳與施政實況間有所出入。此外，臺南州警務部也以另一種視角為執政者和支廳長的舉措緩頰，提出國家稅務是整體考量下而必須為之的一體性作為。

繼佐佐木氏和臺南州警務部之後，1934 年，田中氏也透過東石郡警察

36 廣瀨秀臣，1906～1913 年在鹽水港廳擔任警部補。「恩給證書下付（廣瀨秀臣）」（1914 年 3 月 1 日），〈大正三年永久保存第四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215009。

37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5，頁 98-100。此外，依王振榮所述，森川氏之妻ちよ（千代）在森川氏亡故 3 年後，1905 年 1 月 26 日亡於臺南市永樂町（舊名臺南市外中街 9 號）胡德春處。遺子真一則透過廣瀨秀臣在鹿兒島的師範學校念書，畢業後回臺，任教於臺南州的公學校，與アイ（愛）結婚，二戰結束後被遣送回日本。王振榮，《義愛公傳—超越時空生息的森川清治郎》，頁 14。

38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5，頁 101。

課長等人的媒介，親自拜訪了村民莊隆（時年 53 歲）、李九（時年 62 歲）和黃鄂（時年 52 歲）等人，得到了同前的故事內容。田中氏更呼應時局政策，反思到當年（1934）的臺灣已教育普及，在推展當下實施的同化政策時，森川氏的故事可作為指標案例對外公開，也不會埋沒過去的有功人士，因此為森川氏冠以「部落教化神」的稱號。³⁹同年（1934），鈴木清一郎也在記錄臺灣各地各月份祭典活動、信仰和風俗的《臺灣舊慣冠婚葬祭與年中行事》中，於第 4 月 7 日篇談論義愛公的故事。書中記錄：

東石庄副瀨富安廟主祀從布袋嘴分香而來的觀音佛祖，4 月 7 日為祭典日。配祀的朱、范、池、伍王爺等等是從中國遷移而來，每 5 年進行一次大祭。這間廟以除疫得福之靈驗著稱。大正 12 年（1923）5 月 22 日起更配祀故森川巡查的木像。其由來如 1932 年 5 月的新聞報導（疑實指佐佐木氏的報導），而森川氏也是因為在傳染病發生時顯靈而被奉祀，不論日夜，都可見到參拜居民。在日本內地，巡查被視為神般祭祀之事非常罕見，更何況是在殖民地，（由被殖民者）把母國人的巡查當作神一般尊崇信仰，大概是全世界任何一個殖民地都難有類似案例。⁴⁰

對於森川巡查神像的奉祀源起，鈴木氏也是訪問副瀨的保正李九（時年 62）、保正黃郡（時年 52，富安廟管理者。田中氏寫為「黃鄂」）、時任（1934）東石聯合保甲書記的莊隆（時年 53，曾在森川麾下擔任巡查補），得到大致同前的故事內容，唯竹筏稅成為一艘 4.5 圓。鈴木氏並記錄森川氏的神像是 5 月 22 日雕刻完成，5 月 23 日由居民奉迎祭祀並舉行盛大祭典。⁴¹由於森川氏的品德廣傳，加上祂顯靈防疫，因此有疾病流行時，患

39 田中きわの，〈部落教化の神さま〉，頁 38-39。

40 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頁 373-374。

41 關於入祀祭典日，依前述 1923 年的報導等記載係 5 月 22 日。但鈴木氏和 1936 年的報導說森川氏的入祀和例祭日是 5 月 23 日。參見〈死を超ゆる愛 今は神に祭らるる東石庄の森川巡查〉，《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 年 9 月 30 日，版 5。

家或居民就會來祭拜、祈求，森川巡查也變成像傳染病預防神一般。而在森川氏自殺時年僅 4 歲的兒子森川真一，後來也成為教育家，現正（1934）擔任臺南州新營郡番社庄前大埔公學校長。⁴²

透過以上的各項記錄，我們除見到傳聞與現實的差異（如竹筏稅的金額與詳情）、富安廟管理人名字與事件內容的不同（如主角的生年；土匪來臨時的應變法；廟守名黃郡、黃鄂、黃鄙；入祀日為 5 月 22 日或 23 日等），更主要是可見到時人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觀點。即在 1932 年的臺語教材中，其結論係以森川氏案例鼓勵讀者反思警民關係和「民眾警察」語彙的意涵。1933 年臺南州警務部的敘述，反映出雖為異族的執政者卻熱愛臺灣居民到犧牲自己的正面案例，但徵收漁業稅等作為關乎整體的國家政策和職場職掌區畫，不能僅從個人或民眾的角度思考。1934 年的田中氏和鈴木氏，除表彰日本警察被殖民地臺灣人主動奉為神靈係難能可貴的案例，尤其田中氏認為在官方推展同化政策的當下，森川氏之例宜以「部落教化神」的身分予以推廣公告。鈴木氏則從民間信仰的角度指出，森川氏係身亡多年後的顯靈防疫，故而被居民奉祀在以除疫得福著稱的富安廟（祀王爺），而非森川氏身亡處的慶福宮（主祀中壇元帥李哪吒），並轉化成為傳染病預防神。僅從上述 1932～1934 年間出現的多元論述，已多少呈現了「日警臺灣神」即使在同一時期內，也被賦予，或被期許著承載不同背景人們的不同意念。而就在上述一系列關於森川氏故事的追尋探討後，在臺南州官方的主持下，《明治的吳鳳》這本童書出版了（圖 5）。

42 鈴木清一郎的記錄，為：明治 33 年（1900）8 月 2 日，年約 31、32 的森川氏被調到嘉義辨務署東石港支廳鰲鼓派出所。明治 34 年（1901），民政部設置警察本署，全島的地方官制改為 20 廳，副瀨部落也在地方行政區劃改變後成為森川巡查的負責區域。森川是性格豪邁、清廉潔白且無金錢私慾之人，他從 8 月 2 日到任以來，熱心金援貧民、協助就醫、指導和獎勵產業改良、推廣和鼓勵學習日語、自費慰勞壯兵團、背受傷的黃溪回家而自己受傷更重、結合東石區長吳踏等人努力洗清蔡稠冤屈卻也遭受內地人和長官反感、為竹筏一艘 4.5 圓漁業稅的問題向東石港支廳長園部警部請願不成悲憤自殺、事隔 20 多年後顯靈指導如何防範時疫腦脊髓膜炎等等。因為他對鄉民無私無悔和跨越生命的關懷照顧，因此被鄉民祀奉為神。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頁 374-380。只是，鈴木氏所記錄森川氏轉職的月日和年紀，都與臺南州警務部的記錄（1897 年 36 歲時來臺）有異。



圖 5. 臺南市南門小學校訓導山路曠所繪之《明治の吳鳳》封面。

資料來源：志村秋翠，《明治の吳鳳》，書籍封面頁（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參、「明治的吳鳳」故事譯述與功能神性的強化

承前所述，森川氏的事蹟隨著鄉民口傳、入廟祭祀和 1930 年代以降日本官員的訪查而逐漸流傳開來。尤其今川淵 1932 年就任臺南州知事後，第一次到東石郡巡視時就在東石派出所親自閱覽有關森川巡查的記錄，對森川偉大的功績感嘆許久，以其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激賞之為「明治的吳鳳」。⁴³其後，關於森川氏的調查立起。日本童話協會評議員兼講師，

43 志村秋翠，《明治の吳鳳》，前言頁。此外，依 1929 年嘉義官方所述之吳鳳生平，為：吳鳳的祖籍漳州，住在竹崎庄鹿麻產（今嘉義竹崎鄉鹿滿社區），以開墾、與原住民交易、擔任翻譯員為生。吳鳳憐憫原住民常受到漢族及官員欺侮，因此處事公正；也常關愛原住民，以仁慈待之，並盡力勸導向善。為了讓原住民根除習俗中最不好的獵人頭習慣，吳鳳甚至犧牲自己的人頭，希望原住民不要再出草。吳鳳死後，原住民部落就傳說即將面臨災禍，隨後真的發生連日的大雨和惡疫。原住民們心懷恐懼地請祈禱師詢問神意，說是因為殺死吳鳳而遭來天譴，解決法是必須祭祀吳鳳的英靈和發誓革除獵人頭的風俗。之後，原住民發誓不再出草，各社變得平安，阿里山的物產也得以順利開拓，於是，居民在嘉義社口建起吳鳳廟。後藤新平等官員曾對吳鳳的事蹟大加讚揚，佐久間總督也贈以「殺身成仁」的匾額歌頌吳鳳偉德。原住民更視吳鳳為和平神，每年參加例祭。嘉義街役場，《大嘉義》（臺南州：嘉義街役場，1929 年），頁 39-41。

在各地小學校巡迴演講偉人傳，被稱為「瘤先生」，⁴⁴以作品影響少男少女甚大的童話家志村秋翠，更針對森川氏「為了統治臺灣而犧牲」，甚至被當地鄉民祭拜為神的事蹟，於訪問各級警察等相關人事後，完成《明治的吳鳳——森川清治郎巡查》傳記出版。⁴⁵

關於此書，時任臺南州警務部長的佐佐木金太郎（1898-？）為《明治的吳鳳》作序時，使用相同於鈴木氏 1934 年時的話語說：「巡查死後被視為神祇祭拜之事，在日本本土也罕見發生。更何況這件事是發生在殖民地，由被殖民者自發性地尊崇殖民統治者為神。這件事在全世界任何一個殖民地都很難見到吧！」⁴⁶從佐佐木氏以警察部長的身分引用鈴木氏的話語，更加强呈現出族群、上下位階、殖民與被殖民間的立場迥異，牽帶起森川事件在其中具有的反差與意義。臺南州衛生課長野田兵三（1885-？，國分直一的岳父）為此書作序時，則說：

從日本統治臺灣至今（1936 年），這 40 年間臺灣在教育、產業、交通等方面都有長足進步。這期間，歷經土匪和惡疫危害，在先人們的犧牲下才有今日的臺灣發展，但從未聽過有受鄉民尊崇而被祭拜為神者，只有我們的義愛公森川清治郎巡查，所以被尊稱為明治的吳鳳。該巡查不只實踐警察職務本分，也真誠地對待鄉民，如慈父般，以「義愛」溫情指導和保護鄉民，因此受到鄉民敬慕。這就是一視同仁、君民一體，可為世傳頌的典範。今日祂的傳記出版，相信不僅對少男少女，也能對一般大眾帶來收穫。⁴⁷

野田氏的序言展現出日本統治臺灣 40 年來臺灣的進步，係來自森川氏這類先民無私的付出與貢獻，因此值得被一再傳頌、景仰。臺南州教育課長曾根原弘（1902-1939）為此書作序時，亦是說森川氏平日的修養和令人

44 瘤先生為日本民間傳說中的一角色，帶有在孤獨中尋求慰藉等意思。

45 志村秋翠，《明治の吳鳳》，頁 1-2。

46 志村秋翠，《明治の吳鳳》，頁 1-2。

47 志村秋翠，《明治の吳鳳》，頁 3-4。

敬佩的精神，可作為現代人和讀者的良鑑，也希望大家能廣泛推薦此書。⁴⁸ 撰稿人志村秋翠則自序說，他是基於教育少男少女，推崇森川氏獻身、義愛、殉職殉國精神的目的而撰寫此書。⁴⁹ 在所述的期許與意義認知之下，《明治的吳鳳》一書由 4 個傳記童話所組成，每個故事搭配一幅圖片（圖 6），所有語句都配置注音符號（日語假名拼音）以便利兒童閱讀。以下即略述這 4 個故事。

故事一

約明治 33 年（1900），臺灣還不像現在（指 1936 年）這麼發展時，森川就已經在擔任巡查了。森川是神奈川縣人，小時候非常靈巧，與朋友間的相處也很好。朋友如果向學校請病假，他都會前去探望。這樣的森川，在約 31 歲時到臺灣赴任，服務單位是臺南州東石郡的副瀨部落。每天無論颶風下雨，他都熱心地到各地方巡視、親切地問候鄉民。

有天天氣非常炎熱，突然從田間小路旁跑出一個孩子，大聲叫著「大人（指警察）！蒼經的父親生病了！蒼經在哭！」此時，正在仔細指導鄉民們如何使用鋤在旱田和菜圃間施肥的森川，聽到這個聲音而抬起頭來。他也不擦擦沾了汗水和泥土的臉，就急急地把鋤放下，跟著孩子跑走了。

仍站在旱田上的鄉民們，以感謝的神情看著森川的背影說：「真是好親切的人啊...一聽到窮人生病，即使半夜都會跑去，真是很受他照顧...」「真的是來了個好大人，這個村莊將從黑夜迎來光明了」等等。

蒼經是母親早逝的孩子，他與父親兩人一起貧窮的生活；但父親突然生病，這家人的未來不知如何求生。趕到蒼經家的森川，看到蒼經父躺在昏暗房間一角的床上。他擔心地用手摸摸病人額頭，正燒著呢！

48 志村秋翠，《明治の吳鳳》，頁 5-6。

49 志村秋翠，《明治の吳鳳》，頁 7-8。

森川對蒼經父說：「啊，頭很熱！一定要給醫生看，診療費不用擔心，我先出，你就好好地養生吧。你的妻子早逝，蒼經很可憐，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身體，早點好起來。對蒼經，你也不用擔心。馬上就有醫生會來，而蒼經，晚上就到我派出所吃飯。」離開蒼經家後，森川急忙到醫生家叮囑蒼經的家事，再巡視部落一圈後回派出所。

知道這件事的書房教師莊隆先生，因此去拜訪森川向他致謝。森川讓莊隆先生坐椅子，並奉茶給他。兩人談到，村內的孩子大多不會日語，應該稍稍讓孩子們認識日語。對談後，森川建議莊隆先生可對在書房內學習漢文的兒童們教些日語。森川並從桌子拿出一束紙筆，作為日語測試成績好的同學的獎勵品。認為若孩子們能知道日語，之後大人們也能漸漸會日語，是很好的事。莊隆先生因此帶著紙筆回書房去了。

在雲彩被夕陽染紅的天空下，夜晚靜靜地降臨到平和的漁村中，森川所在的派出所燈光也亮起來了。今晚，在明亮的燈光下，有森川為年幼的蒼經盡心煮好的晚飯。蒼經之父也漸漸康復，將能以爽朗之姿迎接明天的來臨。

故事二

森川有空時會獎勵農作，並自費購買獎品贈予農務成績優良的鄉民。在冬防警戒等時候，也會自費購買食品，慰勞跟警察一起工作的壯丁團們。

有天，發生了黃溪被牡蠣殼割傷，在海中哭泣，而森川進入海中，把黃溪從海岸背著走了 2 公里路回黃溪家，途中自己還受了比黃溪傷口更大 2 倍的傷之事（內容同前述，此處省略）。

他是這麼樣的為村民盡心盡力，所以鄉民們一天比一天愛戴森川，不論什麼事都會找他訴說。

某天，從朴子街處傳來「砰砰砰」地槍擊聲，原來是土匪來患！平時平靜的副瀨村，也被捲入其中。此時，森川和其他東石港辨務支署員和各派出所員一起，搭乘竹筏，在危險的外海上避難。不久後回來，但聽到副瀨村的區長蔡稠被視為土匪同夥而被抓到朴子辨務支署內，將處以死刑。森川說：「蔡稠是了不起的人，不應該被如此對待」，接著就開始蒐集各種證據，想為他平反。

當時，森川從東石區長吳踏⁵⁰開始，拜訪了許多人，包括新井朴子辨務支署長和園部東石港辨務支署長等（指新井榮吉和園部龍因），為蔡稠請命。森川也四處奔走、蒐集證據，並流淚著陳情蔡稠真的是無罪，最後主事官方才漸漸解除對蔡稠的猜疑。

森川就是這麼重情義，不分公私待人的。即使對惡人，他也諄諄教誨，使許多壞人改邪歸正。

故事三

約明治 35 年（1902），副瀨村發生了恐怖的肺鼠疫流行。⁵¹當時的臺灣不像現在（指 1936 年）一樣有許多衛生設備，尤其副瀨村是位在海邊的小漁村，更沒有這些東西，於是患者愈來愈多。警察們急急用竹子當柱、甘蔗作屋頂地建造起隔離病舍，在此收容患者。

某晚，突然間風雲變色，下起大雨；緊急建造的隔離病舍也不敵風雨，開始漏水、吹進風雨，甚至屋頂也被吹壞了。當晚負責執勤的森川，就爬上屋頂，頂著濕透的身體修理屋頂。患者們見到了，就哭著說：「我想死在

50 吳踏，嘉義東石港人，累世以養殖牡蠣為業。吳踏好行善，家運益盛。1908 年起長年擔任樸仔腳第 18 區庄長。1907 年授紳章。臺灣總督府編輯，《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年），頁 268。

51 20 世紀初，國際間已將鼠疫依病症分為腺鼠疫（bubonic plague）、敗血症鼠疫（septicemic plague）和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腺鼠疫占有鼠疫八、九成，患者經接觸感染。若細菌從淋巴擴散到血液，為敗血症鼠疫。細菌擴散至肺部，為肺鼠疫，病菌會隨痰排出體外，再經空氣快速傳播，最為致命。而臺灣在此時發生的鼠疫，類型多屬於腺鼠疫。岡田晴惠，《図解歴史をつくった 7 大伝染病 知られざる世界の裏面史》（東京：PHP 研究所，2008 年），頁 43；〈苦心の結果 ペストの豫防注射に成功（十七）四十周年記念座談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 年 5 月 17 日，版 11。

自己的家裡！大人，請回您的家吧！」還有些患者倉皇地想從隔離病舍逃出去。負責隔離病舍的工作人員因此叫著「啊，大人！大人！」

嚇一跳的森川立刻從屋頂下來，抱住傳染病患者，說：「大家冷靜！現在正在風雨中，你們回家的路上會有生命危險！就冷靜下來吧，這樣我才能安心...。」但患者們仍很害怕，不聽勸，哭著說「大人，就請讓我們回家吧，請讓我在家裡死吧...！」森川又說：「大家好好聽著，我是奉上級的命令保護你們在這裡居住。你們如果一定要離開隔離病舍，我必須以死謝罪。來吧！無論如何都要離開的人，就先把我殺了再出去吧！」森川的兩頰同時流下了熱淚。傳染病患者們聽到平時就很愛護大家、受到大家尊敬的森川這麼說，就停止騷動，改向森川致歉。森川則欣慰地一一幫病患整理寢具，自己則繼續一整晚修理被雨濕透了的屋頂和牆壁。

但是，各位，抱住肺鼠疫患者就像是抱住砲彈般的危險啊！一旦罹患這種傳染病，會發 40~41 度高溫，1~3 日會死亡。而且是會馬上傳染的病。因此，在下著大雨的夜晚，以如此驚人行為工作著的森川，就這樣罹患了肺鼠疫。當晚後又過了三晚，就在他 33 歲時，他留下一名 4 歲的可愛稚兒，離開人間。天上的日月也為他同悲。而副瀨村的人們，就像自己親人過世般地感到悲傷，哭泣著為他舉行盛大的葬式。

故事四

光陰荏苒，森川逝世已 20 多年。大正 12 年（1923）2 月，東石地方流行起腦脊髓膜炎。當月 7 日的深夜，副瀨村的保正李九，夢見已亡故的森川身著他當時的警衣警帽，手提警察提燈，站在李九的枕旁。（其後的故事如同佐佐木氏 1932 年的記錄，此處省略）...森川神像是聘請朴子街媽祖廟前的雕刻師來雕造，神像採森川巡查身著制服制帽坐在椅子上的樣子。完工後，大正 12 年 5 月 22 日，在富安宮舉行盛大的神明入祀儀式。東石地方的人們，從父母到孩子到孫子，一再傳頌義愛公森川巡查的恩德，尊重至今；一有人生病，就把義愛公的神像請到家裡祀奉，祈求病體康復。

森川的孩子真一，現在（指 1936 年）是臺南州北門郡七股庄土城子公學校長。他也繼承亡父的遺志，熱心奉獻於臺灣本島人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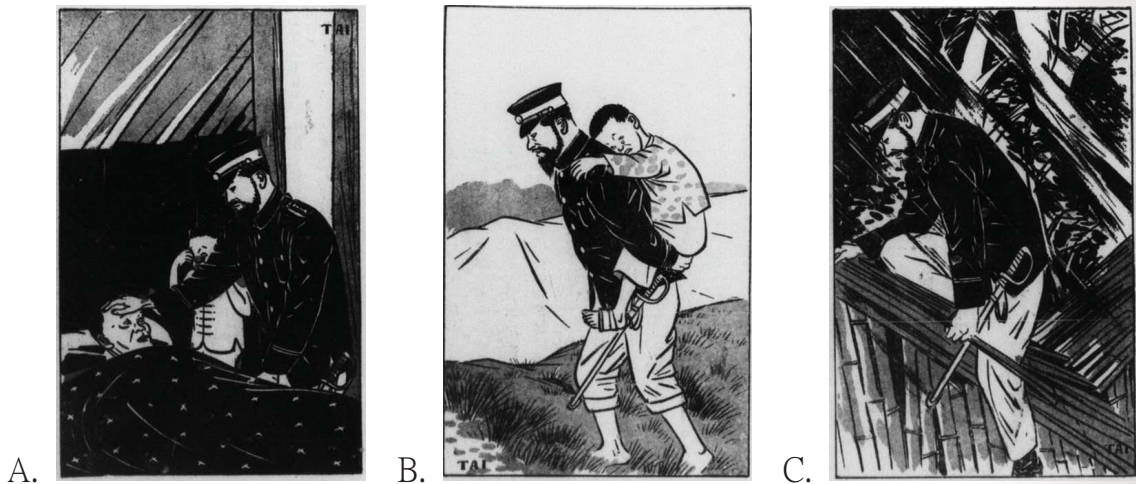


圖 6. 《明治の吳鳳》書中繪圖。A. 森川探望急病的蒼經之父；B. 森川背著腳受傷的黃溪；C. 森川在大風雨中修理傳染病舍的屋頂。

資料來源：志村秋翠，《明治の吳鳳》，頁 5、12、17。

在上述的故事中，故事一、二、四的內容是基於 1935 年前刊載的傳說基礎上，再增加潤飾與隱喻而成。如故事一在陳述森川氏的友愛鄰友、愛民如子、照顧幼疾、鼓勵向學外，也利用「森川讓莊隆先生坐椅子，並奉茶給他」表達（指導讀者）森川氏對教師的尊敬態度。⁵²尤其森川氏是日本人警察，但奉茶、讓坐的對象是殖民地的臺灣人漢學老師，其中也帶有統治階級地位逆差的反差感。這在日治初期殖民者自視較高的氛圍下可能是難得的舉措，但在 1930 年代實施同化政策的當下也具有傳達「內臺一體」思想的時代意義。此外，故事末的結尾是「燈亮了」、「將能以爽朗之姿迎接明天的來臨」，也暗喻著讀者（以中小學生和兒童為主）要抱持信心，明天將會更好的正向理念。故事二係表彰森川氏體諒下屬、照顧鄉民、重

52 類似敬天敬人態度的傳說，也表現在王振榮形容森川氏個性嚴謹、品行端正、尊敬神佛，在臺灣任職期間，「每次經過寺廟門前時，一定脫帽禮拜，並且祈禱國泰民安」。詳見王振榮，《義愛公傳—超越時空生息的森川清治郎》，頁 3。

情義、明是非、勸惡向善。故事四陳述森川氏成神的經過和遺澤永存，其後代也熱心奉獻於臺灣社會。以上所有的故事內容，都指導、鼓勵讀者要以正向、陽光、敬人、奉獻、懷抱希望的態度做人處事。其中，與鄉民口傳故事間差異最大的實屬故事三了。嘉義曾是鼠疫的流行地，森川氏作為巡查，也應曾執行過鼠疫等傳染病防治的工作。但是故事三的內容在諸民間口傳中幾乎無出現過；森川氏不知有無擁抱過鼠疫患者，森川氏之死更與感染鼠疫無關。作為「童話」，如此美化粉飾到大幅修改森川氏死因的作法，一可消除讀者對臺日官方統治策略的負面想像，二可再次加強是前人犧牲才得以換來臺灣明顯進步的正面意義，以及再度連結起森川氏被視為傳染病防疫神的緣由。尤其森川氏是如吳鳳一樣的為民犧牲，造福大眾（避免傳染病散播），才能被稱讚為「明治的吳鳳」。

值得省思的是，雖然《明治的吳鳳》有修潤森川氏的故事和死因，但其後的報紙報導和記述仍是陳述森川氏係因漁業稅問題而自殺。⁵³民俗學者國分直一更針對森川氏作為防疫神的特點，於1936年以「人與土地」為題，探討義愛公、地方民與童乩之間的關係。該文內容先是簡述東石地區人們的精神生活是信仰「低級的迷信宗教」、森川氏成神的典故、在托夢防疫後被鄉民視為傳染病防疫神，繼而以此認為居民祭拜義愛公的主要目的不是追思感謝之心，而是基於更實際的祈求病魔退散的現實精神。如患病之家會把祂的神像請回家裡供奉，還產生相關的巫術、童乩。國分氏再解釋，童乩是以神靈降身或神靈指示，施展其稱為可以治病的法術。關於童乩，1908年已以「臺灣違警令」的法令進行取締，雖然在執行上很困難，但依1918年的調查，臺灣全島尚存1,114名童乩，之後再慢慢減少。只是，在富安宮所在的東石郡，只依當年（1936）6月被檢舉出來的在這地方執業的童乩就有驚人的329名。⁵⁴此外，童乩並非都是教養低俗之人。在同

53 如〈死を超ゆる愛 今は神に祭らるる東石庄の森川巡查〉，《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年9月30日，版5；國分直一，〈義愛公と童乩と地方民〉，頁49-55等。

54 國分氏此處的記錄可能有問題。依增田福太郎，《臺灣本島人の宗教》（臺南市：臺南州衛生課，1937年），頁127-128記錄，是當年全臺灣被檢舉的童乩數為329名，其中東石派出所處有15名被檢舉。

次被檢舉的童乩中，有公學校畢業生、公學校退學者、翻譯者（通譯）、國語（日語）講習所的講習生、在書房學習漢學者等，共計近百名。那為何在「臺灣違警令」實施和不斷檢舉童乩後，東石地區的童乩數量仍多，且地方居民大多數都相信、深信童乩，甚至使森川氏和童乩產生連結呢？國分氏認為，自古以來，東石郡臨海濕氣重，住屋的設計陰暗不通風，當地的經濟、生活與衛生條件均落後不良，居民常發生肺結核、砂眼、瘡疾和各種呼吸器疾病，開業醫的位置又是 2、3 里外之遙，這些都是助長宗教醫療業的可能因素。⁵⁵換句話說，當地居民的衛生與生活落後，需要有人協助他們醫病治疾的對象。而森川氏係因托夢防疫而成神，自然也呼應著居民防疫止病的實際需求而被發揚光大。對此，國分氏也以實例舉證說，童乩說是因為義愛公等等神明指示而給予患者的藥方，常可在藥種商處發現。富安宮的隔壁即是一個賣漢藥的藥種商。⁵⁶簡言之，國分氏的論點主要點出相較於森川氏的愛民和為民犧牲，居民會在 20 多年後才決定祭祀森川氏的主因是因為祂託夢提醒防疫，呼應居民的需求，故而能成為保護地方的「日本王爺」（「王爺」在臺灣民間信仰中多帶有防疫止病的功能），並透過扶乩等方式實際協助信徒退病。另一方面，我們也可再思考的是，比起 1923 年的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1918~1920 年間的霍亂和流行性感冒等疫病大流行其實引起更多臺灣人死傷，包括東石郡。⁵⁷李九會特別在 1923 年夢見森川氏，可能有神蹟，也可能實屬偶然。而地方居民不論神蹟或偶然都決議將日本警察森川氏入祀為神，背後除了祂的品德良善和為民犧牲，也與臺灣民間信仰中會將靈異者入祀供奉的習俗深刻連結。

相關案例，除了臺灣舊有信仰中的保生大帝、池頭夫人、廖添丁等等係從靈異或善行者出身而後成道、成神，異族者中，如繼義愛公之後，在宜蘭縣冬山鄉太和村十三份坑負責看守森林的小林三武郎（?-1944）也是

55 國分直一，〈義愛公と童乩と地方民〉，頁 49-53。

56 國分直一，〈義愛公と童乩と地方民〉，頁 51。

57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五十一年統計提要》（臺北：古亭書屋，1946 年），表 490。

愛民如子，⁵⁸二戰結束後，由於新來的巡山員拚命想從貧苦的百姓身上撈油水，讓鄉民們更懷念小林的作為，就幫祂蓋了有應公廟。後因靈修人士們前來通報玉皇大帝旨令，說小林仔公從有應公升格為土地公；村民在永福宮三山國王廟擲筊詢問，連連聖筊後，2004 年透過晉陞儀式升格之為土地公，成為臺灣罕見的日本籍土地公。⁵⁹再如臺南市內的鎮安堂又名飛虎將軍廟，祭拜海軍飛行兵杉浦茂峰（？-1944）。「飛虎」意味著戰鬥機，「將軍」是對杉浦的尊稱。據說杉浦氏在駕駛零式戰鬥機迎擊轟炸臺灣的美軍飛機時被擊中，為了避免飛機墜落傷及無辜，駕駛員讓飛機避開人口密集的海尾村，墜毀於村外的魚塢中。該魚塢在 1970 年代屢發生靈異事件，村民向保生大帝祭拜後，得到指示要供奉之，故於 1971 年建廟安奉。⁶⁰當時臺灣正是威權統治時代，為避免觸犯禁忌，村民將雕像的面部抹黑，直到 1990 年代臺灣解嚴後才恢復原貌。⁶¹這些案例所共有的特色，是祭祀神在生前都為民服務，身亡後曾發生靈異，或透過乩童、靈媒等向居民傳達需要奉祀或升格的指示。

其他在臺灣祭祀日本人的廟宇，還有如：在高雄市鳳山紅毛港的保安堂，供奉曾發生靈驗事蹟的「海府大元帥」和日本軍艦。⁶²屏東枋寮隆山

58 小林氏的職務應是防止民眾偷木材，但他知道一般人生活困苦，就常放水，還在入山口「奉茶」，甚至在長官突襲檢查時大聲提醒偷木材的人。小林氏還圈養公豬、公雞、公鴨，免費讓鄉民配種使用，只是常無法一次就成功，後來當地也暱稱小林氏為「摸一蓋桑」（もう一回さん，意即再一次先生），還流傳俗諺「小林仔公牽豬哥」，意思就是「再一次」。珮芸，〈外國人也能成神？——異鄉人如何融入臺灣信仰〉，《人本教育札記》，335 期（2017 年 5 月），頁 81。

59 楊宜敏，〈異鄉成神 日籍土地公想回家〉，自由時報網站，2006 年 8 月 23 日，goo.gl/misqSt（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60 臺南市海尾朝皇宮管理委員會，〈海尾鎮安堂飛虎將軍〉，鎮安堂網站，goo.gl/Zjdy47（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61 威克，〈臺灣的抗戰：保生大帝的日本飛行員徒弟〉，BBC 中文網網站，2015 年 7 月 23 日，goo.gl/XZIFGv（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62 相傳紅毛港漁民出海捕魚時，在海上撈獲其骨骸，入祠供祀並以「海府」尊稱。後來海府靈驗，村民乃集資重建，並經託夢及透過不懂日語之乩童以日語表示自己是日本第卅八號軍艦中尉，在二次大戰中陣亡。1990 年 8 月，信徒依海府神諭指示，到日本琉球找到日軍紀念碑，並記載有卅八號軍艦被擊沉的史實。隔年，保安堂再興建完成艦身長 2.7 公尺，分為 3 層，內有軍官、士兵共 72 人，各司其職的軍艦，奉祀於廟內。方志賢，〈全臺唯一供奉日本軍艦 紅毛港保安堂落成 日人贈軍服〉，自由時報網站，2013 年 12 月 30 日，goo.gl/bbHhiu（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村的東龍宮，祭祀著託夢要建廟的日本帝國海軍將軍田中綱常（1842-1903）。左右護法是祂的兩名部屬，還有兩名穿著和服的日籍護士女神。⁶³苗栗縣獅頭山勸化堂祭拜獨自犧牲好讓臺灣兵得以投降存活的廣枝音右衛門（1905-1945）。⁶⁴臺南市東區的慶隆廟，又名白馬將軍廟，主神謝府元帥旁的左輔神是身著近代官/軍服的日本人「（謝）吉元將軍」。⁶⁵屏東縣東港共和新村的保箴大將軍祠，供奉空襲身亡的日本人。⁶⁶屏東縣東港分局附近的靈聖堂，位在原日本時代的火葬場焚化爐前，因屢有日本軍魂顯靈，故建廟祀奉日本軍隊、將軍、大使，以及身著和服的日本女醫師和地藏王菩薩等。⁶⁷這些在臺灣祭祀日本人的廟宇中，有不少是因為後世為了感念而立像祭拜，或因靈異事件而奉祀為神（多數屬陰廟），與義愛公的性質多少有異。而在上述所有的日本神靈中，以東石義愛公被祭祀的時間最長久、香火最鼎盛。

肆、結語：超越天地時空的愛民與義行

從本研究所示之臺灣人在富安宮祭拜日本警察神的案例，呈現了多種的特色與意義。第一，若從殖民政策或教育宣傳的角度視之，1902年森川氏的事蹟出現時，由於祂被視為反抗統治者（殖民者）權威的象徵，對治

63 田中將軍曾參與牡丹社事件，擔任澎湖廳長和臺北縣知事（管轄地約今臺北市、新北市、宜蘭縣及基隆市）。據傳田中將軍托夢說要蓋廟，於是信眾籌資興建。洪明生，〈臺灣廟拜日本神 祭祀臺日合璧〉，民視新聞網站，2012年9月2日，goo.gl/P2TvDR（2017年10月4日點閱）。

64 據傳廣枝氏是神奈川縣人，1930年起歷任新竹大溪和大湖郡的巡查。二戰末期，他擔任海軍巡查隊隊長，隊上有數千名臺灣人日本兵。1945年美軍在馬尼拉登陸，上級指示要全員帶著彈藥與美軍同赴生死，但廣枝氏卻獨自承擔責任、開槍自殺，讓臺灣人向美軍投降、回到臺灣。1976年起，當時的小隊長劉維添開始組織倖存者，並在獅頭山勸化堂供奉廣枝隊長的牌位，年年舉辦慰靈祭。鄭鴻達，〈動容！二戰日警不惜自裁 保全2000名臺籍兵性命〉，自由時報網站，2015年8月28日，goo.gl/R9iDDy（2017年10月4日點閱）。

65 黃博郎，〈慶隆廟 日將軍同享香火〉，自由時報網站，2010年1月26日，goo.gl/1MPLbR（2017年10月4日點閱）。

66 許智鈞，〈防空洞上祠堂 學者揭神祕面紗〉，中時電子報網站，2015年9月3日，goo.gl/msZVYs（2017年10月4日點閱）。

67 李立法，〈軍魂無依 日將托夢建廟〉，自由時報網站，2007年1月23日，goo.gl/nmbbDC（2017年10月4日點閱）。

臺初期統治權力尚不穩定的日本政權而言是項傷害，若能將此事件盡量隱晦，對執政者而言也許是個必須手段，故而史料和媒體報導均缺。但到了 1920 年代，日本對臺灣的統治已相當穩定，且臺灣已經過 1918 年歐洲戰爭結束後的民族自覺、大正民主、地方自治權力提升等風潮，加以 1923 年 4 月東宮太子臺灣行啟前後，臺灣全島崛起歌頌日本治臺業績的言論和更加注重衛生防疫，使森川氏託夢成神的事蹟並無受到當地警方阻攔，被列入當地警察記錄地方民情的「須知簿」中，並被《臺南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公開報導。接著，隔了近 10 年的沈寂之後，從 1932 年佐佐木氏和 1933 年臺南警務部更詳細（或說更加油添醋）報導森川氏成為「臺灣神」的事蹟，到 1934 年森川氏也被視為部落教化神，再到 1937 年森川氏被與曾受到後藤新平和佐久間總督等官員讚揚之殺身成仁的吳鳳相比擬，以及出現過於美化到失真（如擁抱肺鼠疫患者而病逝）的森川氏童話……森川氏的事蹟到 1930 年代，在執政者的筆下，愈來愈具有「物語」（故事）創作的「虛像」和可供利用的政治內涵；而其時代背景，正是 1930 年代臺灣各地逐漸興起的部落振興/教化和內地同化（皇民化）運動。與此同時，比起政府教化，森川氏的顯靈與乩身助人，對 1930 年代的臺灣民間大眾來說，才是使之真正具有真實、實用，讓民眾心悅誠服崇拜的「實像」。簡言之，從口傳故事在不同時期和不同記錄者所著述的重點和差異，可見到同一故事在不同時期能被賦予多種多樣適合各該時代的意義與想像。森川氏可以是愛民的、顯示執政者統治臺灣之用心與不易的、帶有內臺同化意義的、作為反抗執政或殖民權威的、或是擔任防疫神救濟普遍眾生的多種身分。森川氏是以森川氏、義愛公的身分存在，也是為了時人的實際需求而存在。

第二，無論各種記錄顯示之人名、生年、作為、死因等等差異或事件虛實，重點都是要強調森川氏的濟眾和為民犧牲，尤其森川氏亡故多年後，仍在疫病流行時不分群我、愛民如子的顯靈救人。這是使森川氏由「人」轉為「（瘟）神」，成為居民尊奉的「義愛公」、「日本王爺」的關鍵。對殖

民統治者來說，義愛公被視為「日本人在殖民地臺灣時受尊敬而成為神明」，這是可以宣傳執政官員政績、表彰殖民統治者以德善待人民的好故事。尤其若將事件中可能涉及官府政策蠻橫觀感的漁業稅事件予以釐清或加以修飾，如臺南州警務部查閱各種資料也無見到竹筏稅數圓的法令、《明治的吳鳳》童話書改編森川氏死因成為為了防止傳染病擴大而病死等，更能使森川氏的故事成為日本統治臺灣善政和官民一心的良好樣版。但對臺灣人而言，義愛公這類的日本人神明並非政治事物，而是循著臺灣民間信仰的法則——為民犧牲和顯靈護佑——而產生，因此「普遍被視為受壓迫被殖民者」的臺灣人，能跳脫對異族統治殖民者的不信任與恐懼，甚至自願將異族者的「人格」提升為「神格」，以神事祭之。這是臺灣人性情純厚、跳脫殖民與被殖民以及族群對立思想的一面，更是臺灣人維持既有宗教習慣（祭拜靈異者）和應用之於實際生活（如祈禱防疫止病和藥籤治病）處事態度的延續。尤其義愛公的防疫功效最被稱頌，因此祂不僅透過顯靈來防疫，更能透過神像鎮疫鎮境，和藉著童乩傳達藥方，深入到信徒的家中和生活內，成為當地居民本土化和在地化信仰的一環。

最後，作為日本警察、日本統治時期地方基層行政代表的義愛公，其身分在二戰結束後臺灣社會轉為仇視日本的氛圍中變得「不合時宜」。但因居民堅持信仰，再加上森川氏生前屢屢為居民反抗上級日本長官，如為蔡稠平反、陳情修改漁業稅，尤其因反對殖民政策不成而自殺等，使之也可被視為抵抗殖民不當統治，與臺灣人一起反抗日本人的象徵，也因此得以安然度過戰後臺灣的仇日意識浪潮。據說，臺南善化孫江淮（1907-2013）曾講述一個義愛公之所以被稱為「義愛公」，和取漢名「余漢魂」的傳說故事：「『余』乃漢人之漢人姓氏，名『漢魂』乃漢人常用之名，漢人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特性，靈魂因之殺身成仁。成道後，民眾乃取『義愛』二字為神明名而奉祀祭拜。」⁶⁸義愛公何時被取了漢名「余漢魂」，我們不

68 本引文取自黃國哲選編，《義愛公之相關記載》（嘉義：奇嶽工作室，2005年），頁38，轉引自洪瑩發，〈臺灣王爺信仰的傳說研究——以臺南地區為主的考察〉（花蓮市：東華大學民間文學所博士論文，2013年），頁261。但洪氏認為「余漢魂」是起自日治時期的稱呼，筆者對此持不同看法。

得而知，從現有的日本時代記錄中也未曾得見；但在日治與戰後國府之不同的政治社會氛圍下，有可能義愛公的漢名「余漢魂」實是二戰結束後才產生，以「我」乃「漢人之魂」之名，避免因崇拜日人招惹麻煩，也再次顯示義愛公的身分和意義可因時空所需而有多種轉化的可能。

時至當代，義愛公的信仰已隨著當地居民的遷徙而擴大，各地陸續出現分靈宮廟。如嘉義縣的朴子天旨堂、東石鄉龍港村三太子壇，嘉義市小湖里的小副瀨富安宮、小副瀨富義宮、小副瀨富南宮，彰化和美的平安宮和臺北新莊的北巡聖安宮等（圖 7），都有主祀或副祀義愛公。以義愛公分靈到臺灣最北邊的新莊北巡聖安宮為例，係因為鄉親蔡水音欲北上定居，在村民的允許下將義愛公請到新莊膜拜。⁶⁹據今日的廟務打理者說，原本蔡氏將義愛公奉於樓上自宅，以自宅開設宮廟，後因空間狹隘，改於自宅旁的樓房 1 樓拓建蓋廟，並請人協助管理。初代的廟務打理者本來會吸菸喝酒兼鬧事，但開始管理宮廟後，一下子煙酒全戒，也不再危害鄰里。又目前每周六的起駕辦事，是請義愛公主事；信眾的問題從健康到姻緣，非常多元。⁷⁰從前述廟務打理者的口述，呈現著即使到當代，義愛公仍是以保衛生命的「衛生神」到管理生活大小事的身分功能存在。⁷¹顯示無論原始或延伸的目的為何，義愛公的信仰對臺灣信眾而言，係是跳脫政治意涵，以「超越天地時空的愛民與義行」的善良旨意和實際功能而源遠流傳。

69 又如彰化和美平安宮則是因為信徒包了富安宮的中爐香灰三包放入平安宮的中爐，結果義愛公借平安宮的乩童說出日語，此後平安宮即祀奉之。尾原仁美，〈臺灣民間信仰裡對日本人神明的祭祀及其意義〉，頁 55-90。此外，王振榮，《義愛公傳——超越時空生息的森川清治郎》，頁 14 記錄，森川真一與妻子愛並無子嗣，愛在 1986 年逝世前，每一年都親自參與義愛公的祭典。廣瀨秀臣的外孫岡勳氏（1942-）在拜訪富安宮後，此後每年舊曆 4 月 8 日的義愛公大祭也會來臺參拜。而富安宮內有三尊義愛公神像，本尊外，另二尊副像分別是由森川愛女士及岡勳氏寄贈。2000 年，新莊北巡聖安宮還帶著義愛公神像到橫濱想找尋神人故居，也有被橫濱地方報紙報導。2002 年森川氏亡故百周年時，3 月 17 日成立「富安宮義愛公聯誼會」。

70 筆者訪問北巡聖安宮廟務打理者陳景川先生，時間：2018 年 2 月 8 日下午 4 時。

71 此外，作為分靈廟的北巡聖安宮，主神為港口媽（媽祖），配祀王爺、義愛公等諸神；與主廟東石富安宮以五府千歲（王爺）為主神，配祀和配天宮媽祖義愛公等諸神的做法不同。又北巡聖安宮南下進香時，富安宮、慶福宮、港口宮仍是必訪之處，但聖安宮的信眾和管理人們已脫離東石鄉民的範疇，成為新莊接坊或更廣泛地域信眾的信仰場所。筆者訪問北巡聖安宮廟務打理者陳景川先生，時間：2018 年 2 月 8 日下午 4 時。另有傳說說，有乩童表示義愛公能成神是嘉義笨港港口宮媽祖協助通報天帝而得到認可的，而之後每年港口宮媽祖遶境時，富安宮都會重禮迎接。珮芸，〈外國人也能成神？——異鄉人如何融入臺灣信仰〉，頁 81。



圖 7. 北巡聖安宮的神壇與義愛公神像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北巡聖安宮，時間：2018 年 2 月 8 日下午 4 時。

附錄：關於義愛公的臺灣詩二首

黃傳心（1895-1979）作〈東石漁港竹枝詞〉之六：

勿去相連副瀨村，一碑義愛表忠魂。春風十里農場路，婦人成群削蔗根。⁷²

楊爾材（1882-1953）作：

心慈未忍迫窮民，課稅遲輸意莫申。騷首受司嚴譴責，舍身取義竟成仁。

生為冰雪清廉即，昇作英靈正直神。血食千秋應報德，森川像塑當貞珉。⁷³

72 黃傳心、柯絳英，《劍堂吟草（附續集）·丹心集》（臺北：龍文，2006 年），頁 29。

73 楊爾材，《近樗吟草》（嘉義：近樗草堂，1953 年），頁 56。

參考書目

一、檔案

《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00002215009，〈恩給證書下付（廣瀨秀臣）〉。

00006890012，〈教員免許狀授與（森川真一）〉。

00001456005，〈園部龍因ニ恩給下賜ノ件（內閣總理大臣）〉。

二、史料彙編、年鑑、辭典、工具書

森川愛口述，平井新著作，王力生翻譯，《義愛公傳》。臺北縣：新莊北巡聖安宮管理委員會，1999 年。

新高新報社，《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

嘉義廳編輯，《嘉義廳報》。第 8 號（1901 年 12 月 16 日）。

臺南州，《臺南州例規 下》。臺南市：臺南州，1923 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五十一年統計提要》。臺北：古亭書屋，1946 年。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44 年。

臺灣總督府編輯，《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年。

三、報紙

《臺南新報》，臺南，1921 年至 1937 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898 年至 1944 年。

四、專書、專書論文

王振榮，《義愛公傳—超越時空生息的森川清治郎》。臺北：三友圖書，2002 年。

黃國哲選編，《義愛公之相關記載》。嘉義：奇嶽工作室，2005 年。

- 黃傳心、柯絳英，《劍堂吟草（附續集）·丹心集》。臺北：龍文，2006年。
- 楊爾材，《近樗吟草》。嘉義：近樗草堂，1953年。
- 戴文鋒，〈臺灣唯一的日本王爺——東石鄉副瀨村富安宮的故事〉，《文學講古——鄉鎮的故事》。臺北：行政院文建會，2001年。
- 志村秋翠，《明治の吳鳳》。臺南市：臺南みどり社，1937年。
- 岡田晴恵，《図解歴史をつくった 7 大伝染病 知られざる世界の裏面史》。東京：PHP 研究所，2008年。
- 國分直一，〈義愛公と地方民〉，《南方臺灣民俗考 壺を祀る村》。東京市：三省堂，1944年。
- 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4年。
- 嘉義街役場，《大嘉義》。臺南州：嘉義街役場，1929年。
- 増田福太郎，《臺灣本島人の宗教》。臺南市：臺南州衛生課，1937年。

五、期刊論文

- 江志宏、郭盈良，〈嘉義市小副瀨「義愛公」信仰的社會意義〉，《嘉義研究》，第 1 號（嘉義：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10 年 3 月），頁 241-279。
- 沈佳姍，〈日本統治時期臺灣腦炎防疫及其病名之確立〉，《臺灣風物》，第 64 卷第 4 期（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4 年 12 月），頁 111-152。
- 東石生，〈入賞 神に祀られし森川巡查の實話〉，《語苑》，第 25 卷 5 期（臺灣：臺灣語通信研究會，1932 年 5 月），頁 54-62。
- 洪瑩發，〈臺灣王爺信仰的傳說研究——以臺南地區為主的考察〉，東華大學民間文學所博士論文，2013 年。
- 珮芸，〈外國人也能成神？——異鄉人如何融入臺灣信仰〉，《人本教育札記》，第 335 期（臺北：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2017 年 5 月），頁 81-83。

黃國哲，〈日本巡查，臺灣神明——「義愛公」的田野調查〉，《民俗與文化》，第 4 期（臺北：淡南民俗文化研究會，2007 年 10 月），頁 192-202。

田中きわの，〈部落教化の神さま〉，《臺灣》，第 39 期（臺北：臺灣通信社 1934 年 7 月），頁 38-39。

佐佐木周次郎，〈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 一〉，《臺灣警察時報》，第 196 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2 年 3 月），頁 79。

佐佐木周次郎，〈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 二〉，《臺灣警察時報》，第 197 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2 年 4 月），頁 61。

尾原仁美，〈臺灣民間信仰裡對日本人神明的祭祀及其意義〉，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國分直一，〈義愛公と童乩と地方民〉，《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415 期（臺北：臺灣教育會，1937 年 2 月），頁 49-55。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1，《臺灣警察時報》，第 206 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3 年 1 月），頁 129-133。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2，《臺灣警察時報》，第 207 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3 年 2 月），頁 63-67。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3，《臺灣警察時報》，第 208 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3 年 3 月），頁 102-104。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4，《臺灣警察時報》，第 209 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3 年 4 月），頁 134-138。

臺南州警務部，〈神に祀られた警察官〉5，《臺灣警察時報》，第 210 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3 年 5 月），頁 98-101。

六、網頁、資料庫、其他

Google，〈東石富安宮〉，Google 地圖網站，goo.gl/HVKb29（2018 年 4 月 29 日點閱）。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製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資料庫，goo.gl/q924mv（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 方志賢，〈全臺唯一供奉日本軍艦 紅毛港保安堂落成 日人贈軍服〉，自由時報網站，2013 年 12 月 30 日，goo.gl/bbHhiu（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 江俊亮，〈日本醫療團到阿里山義診 為老人量血壓把脈〉，臺灣大紀元網站，2003 年 7 月 15 日，goo.gl/3QWg7F（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 李立法，〈軍魂無依 日將托夢建廟〉，自由時報網站，2007 年 1 月 23 日，goo.gl/nmbbDC（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 威克，〈臺灣的抗戰：保生大帝的日本飛行員徒弟〉，BBC 中文網網站，2015 年 7 月 23 日，goo.gl/XZIFGv（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 洪明生，〈臺灣廟拜日本神 祭祀臺日合璧〉，民視新聞網網站，2012 年 9 月 2 日，goo.gl/P2TvDR（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 徐彩媚，〈日警祭拜警察神〉，2011 年 3 月 11 日，臺灣蘋果日報網站，goo.gl/XdMubg（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 副瀨富安宮，〈副瀨富安宮略史〉，副瀨富安宮網站，<http://hgj0949.myweb.hinet.net/>（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 許智鈞，〈防空洞上祠堂 學者揭神祕面紗〉，中時電子報網站，2015 年 9 月 3 日，goo.gl/msZVYs（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 黃博郎，〈慶隆廟 日將軍同享香火〉，自由時報網站，2010 年 1 月 26 日，goo.gl/1MPLbR（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 楊宜敏，〈異鄉成神 日籍土地公想回家〉，自由時報網站，2006 年 8 月 23 日，goo.gl/misqSt（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 臺南市海尾朝皇宮管理委員會，〈海尾鎮安堂飛虎將軍〉，鎮安堂網站，goo.gl/Zjdy47（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 鄭鴻達，〈動容！二戰日警不惜自裁 保全 2000 名臺籍兵性命〉，自由時報網站，2015 年 8 月 28 日，goo.gl/R9iDDy（2017 年 10 月 4 日點閱）。
- 沈佳姍訪問北巡聖安宮廟務打理者陳景川先生，時間：2018 年 2 月 8 日下午 4 時。
- 沈佳姍訪問東石慶福宮服務櫃臺，時間：2018 年 2 月 13 日上午 10 時 40 分。

A Study of How Japanese Police Becoming Taiwan Deity Belief via Legendary Story ‘Yì Ai Gōng’'s True and False

Chia-San Shen^{*}

Abstract

Japanese police Morikawa Seiro also named Yì Ai Gōng (義愛公). Yì Ai Gōng as a god of Taiwanese, his legend stories were changed with different discrepancies, as well as his identity symbols were changed with Taiwan people, local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police colleagues, folklore scholars, different period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atmosphere and so on. Following the multiple discourses, this paper through translation, textual research and comparison of the historical data under the Japanese ruling period, to explore the actual situation, deformation, and changing of faith meaning of Yì Ai Gōng.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legend story of Yì Ai Gōng was obscured in the 1900s, started reported when he becoming a God in the 1920s, and been popularized in the 1930s. Especially in the 1930s, the multiple discourse included: A. encourage readers to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ice and the public and thinking a word ‘public police’'s meaning; B. too loved to sacrifice for different nation was praiseworthy, and we should use variety angles to look at events; C. Yì Ai Gōng can regarded as a ‘Tribal God’ to promote the assimilation policy; D. Yì Ai Gōng was regarded as a useful medical God and go depth into the local population's life. The above mention shows that the identity and meaning of Yì Ai Gōng may change due the necessary of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Yì Ai Gōng Morikawa can be exist as original Yì Ai Gōng Morikawa, but also exist for the actual needs of people in further.

Keywords: Meiji's Wu Feng, Japanese Police, Gods of Taiwan, Dongshi Township of Chiayi County, Yì Ai Gōng (義愛公), Medical God, Spiritual Medium (Dang-Ki, 童乩)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